

“藏彝走廊”研究与 民族走廊学说

李绍明^①

“藏彝走廊”是我国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首先提出的一个学术概念，它主要指川、藏、滇边境横断山脉地带的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岷江共六条由北向南流的大江及其主要支流分布的地区，包括藏东高山峡谷区、川西北高原区、滇西北横断山高山峡谷区以及部分滇西高原区，故这片区域又称为“六江流域”。但它并非六江流域的全部，主要是怒江、澜沧江的下游不在此区之内。这片区域现今居住着藏缅语族的藏、彝、羌、白、纳西、傈僳、普米、独龙、怒、哈尼、景颇、拉祜、基诺等民族，以藏语支和彝语支的民族居多，故亦称之为“藏彝走廊”。此六条江的下游还有壮侗语族的傣族和苗瑶语系的苗族乃至孟高棉语族的一些民族居住，但不占多数。“藏彝走廊”自古以来就是藏缅语族诸民族南下和壮侗、苗瑶语族诸民族北上的交通要道和众多民族交汇融合之所。在这些峰峦重叠、河谷深邃的高山峡谷中，不仅居住着若干兄弟民族，而且至今还保存着即将消失的被某一民族语言淹没的许多基层语言。同时还积淀着许多至今还起

^①作者为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学术委员、教授。



作用的历史遗留，这表现在他们的宗教、文艺、风俗、习惯等诸方面。从石器时代起一直到近现代，众多民族都在这里留下了他们自己活动的实物证据，其内容之丰富，丝毫不亚于中原地区。所有这些宝贵资料，对于研究我国西南地区及至中南半岛各民族的起源、迁徙、关系以及各民族的社会、历史、语言、宗教、文化诸方面，均具有重大的科学价值。而这一研究对于我国巩固国防、开发边疆、增进民族团结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亦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藏彝走廊”研究最早是由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他在1978年9月全国政协的一次会议上讲：“我们以康定为中心向东和向南大体上划出了一条走廊。把这条走廊中一向存在着的语言和历史上的疑难问题，一旦串联起来，有点像下围棋，一子相联，全盘皆活。这条走廊正处在彝藏之间，沉积着许多现在还活着的历史遗留，应当是历史与语言科学的一个宝贵的园地。”接着他又指出：“如果联系到上述甘南、川西的一些近羌语和独龙语的民族集团来看，这条夹在藏彝之间的走廊，其南端可能一直绕到察隅和珞瑜。”^①费先生的这段讲话在全国，尤其是在西南地区的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重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81年11月，在昆明召开的包括川、藏、滇、黔、桂、京各省市学者参加的中国西南民族研究会首届学术会议上，与会同志一致认为应组织社会科学各有关学科在内的民族综合考察队，逐步对“藏彝走廊”即六江流域进行深入的实地考察。当这个消息反馈回北京以后，费先生非常高兴。他又在1981年12月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的一次会议上再次论及“藏彝走廊”研究的

^①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



重要性。他说：“最近听说西南几省的民族研究工作者联合起来一起攻关，要在藏彝之间的走廊地区进行一次调查，那是很好的。”接着他又说：“从宏观的研究说来，中华民族所在的地域至少可以大体分成北部草原地区，东北角的高山森林区，西南角的青藏高原，藏彝走廊，然后云贵高原，南岭走廊，沿海地区和中原地区。这是全国这个棋盘的格局。我们必须从这个棋盘上的演变来看各个民族的过去和现在的情况，进行微型的调查。”^①

为了推动“藏彝走廊”民族综合调查的实施，1982年3月15日我国知名学者和有关省区领导同志16人（按姓氏笔画为序）：马曜、尹达、方国瑜、牙含章、多吉才旦、任继愈、孙自强、林耀华、杨汉先、秋浦、夏鼐、徐中舒、翁独健、费孝通、傅懋勤、梁新华等，联名向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胡乔木、杨静仁、江平、梅益、宦乡等书面建议，尽快开展这一工作。当即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大力支持，使得此次民族综合考察工作得以及时开展。1982年4月，费孝通先生来到昆明，在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作了题为《支持六江流域民族的综合调查》的发言。他再次说明这次民族综合考察的重要意义：“好就好在，第一条它打破了行政上的界限，第二条它打破了学科的界限，进行综合研究。”并再次鼓励大家和要求大家：“我们不要一个虚名，不要人民拍手，不要搞得热闹，要扎实地工作。现在的名声比我们实在做的已经超过很多，我们必须脚踏实地地去做，慢一点不要紧，不要急躁，不要踏空。”^②

在费孝通、马曜先生等老一辈著名学者的关怀下，中国西南民

①费孝通：《民族社会学调查的尝试》，载费孝通著《从事社会学五十年》，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②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



族研究学会六江流域民族综合科学考察队于1982年5月正式建立，由学会秘书长李绍明同志任考察队队长，学会副秘书长童恩正、何耀华、平措次仁三同志任副队长，并首先确定在雅砻江下游与怒江中游两处进行科学考察的试点工作。雅砻江下游的考察包括四川凉山州的冕宁、木里、盐源三县和攀枝花市的米易、盐边两县和仁和区以及附近的一些区域。考察的民族为藏族、彝族、傣族、纳西族、傈僳族和苗族。参加的单位有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系、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云南省民族研究所、云南省历史研究所、云南大学西南边疆民族历史研究所、贵州省博物馆、上海复旦大学人类学研究室、上海市中心血站以及凉山州、攀枝花市及有关县市有关单位的同志共62人，学科领域包括民族学、民族史、民族语言学、社会学、考古学、体质人类学等。怒江中游的考察包括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贡山县和西藏自治区的察隅及其相邻的一些地方，考察的民族为独龙族、藏族、珞巴族和僜人。此次怒江考察任务主要由云南省民族研究所的四位同志承担。考察的重点为这些民族的社会、经济、历史、文化、宗教、习俗及民族关系等方面。

当六江流域民族综合考察队组成并分赴有关地区考察之时，费孝通先生又于当月，即1982年5月在武汉社会学研究班和中南民族学院部分同志座谈会上发表了《谈深入开展民族调查问题》的讲话，再次阐述了“藏彝走廊”的研究问题。他说：“我也曾称它作藏彝走廊，包括从甘肃到喜马拉雅山南坡珞瑜地区。珞瑜地区的民族构成，外国人搞不清楚。这里发现有水田技术很高的阿帕达尼人。他们从哪里来的呢？……再下去到缅甸北部、印度东北部的那加地区。这一带都是这一相似类型的民族，看来都是这条走廊里的民族，都在藏族和彝族之间的地区里。”他又说：“我们要把这些现象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从历史上、从现在的语言、



体质、文物、社会结构、风俗习惯、神话、传说等等，综合起来进行考察。假如我们能把这条走廊都描写出来，可以解决很多问题，诸如民族形成、接触、融合、变化等。我是在 1979 年提出这个问题的。现在四川、昆明的同志们准备开始研究这些问题了，西藏也参加了。……这个计划，领导上很支持，说很好。但是不是那么容易，要做很多工作。我这次到成都、昆明，他们第一批就要出发了，先下去看看，尝试一下。有点基础了，大家再来一起讨论。”^①由此可见费先生认为“藏彝走廊”研究是一项重点工程，有相当难度，并非一蹴而就，只有持之以恒，方能奏效。

六江流域民族综合考察的两处试点，在经过 3~5 个月的工作后，基本告一段落，最终形成 3 本考察报告，即李绍明、童恩正主编《雅砻江下游考察报告》、杨毓骧编《独龙族社会历史综合考察报告》和《滇藏高原考察报告》，均相继于 1983~1984 年内部出版。这些调查报告中包括各专题调查报告三十余份，涉及的面很广，几乎涵盖了民族研究的各个领域，有许多地域和问题是以前所未能涉及到的。此 3 本调查报告中的《滇藏高原考察报告》已在 2000 年以“伯舒拉岭雪线下的民族”为名，由云南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1984 年 7~9 月，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又组织了一次雅砻江上游的民族综合考察试点。此次考察的地域在甘孜州北部雅砻江所流经的几个县，考察队成员十余人，分别来自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系与经济系、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北京大学经济系以及甘孜州和攀枝花市的有关单位。此次考察的特点在于增加了现实经济的内容。考察最终形成由李绍明、童恩正主编的《雅砻江上游考察报告》，内含各专题调查报告 7 份，于

^①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 1988 年版。



1985 年内部出版，亦受到学术界好评。

对“藏彝走廊”的研究，除了进行民族综合考察之外，在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倡导下，主要还做了如下一些工作：

其一是西南丝绸之路研究。古代西南丝绸之路是从成都出发，经四川西南部，再经云南，越缅甸、印度、中亚，直至西欧的商道。这条道路所经之地有很大一部分在“藏彝走廊”地区。该路在历史上有着重大的作用，但以往并未在我国学术界取得共识。因此，研究这一课题具有重大学术意义和现实价值。1986 年，由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副秘书长、四川大学考古学教授童恩正主持的“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综合考察”课题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原拟在古道沿线进行一系列考古发掘，后因故未能实现，但仍组织了有关人员，沿途作了一些考察与较广泛的研究，其成果最终由伍加伦和江玉祥主编形成《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第一辑和第二辑，分别于 1990 年和 1995 年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对西南丝绸之路主线以外的一些支线如盐井古道等也有一些成果问世。为了扩大研究范围，在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倡导下，川滇两省古代丝绸之路沿线的 14 家文博考古单位于 1990 年初联合举办了“南方丝绸之路文物摄影艺术展览”，在川滇许多重要城市展出，影响极大。1990 年 8 月，在西昌市由凉山州博物馆主办，召开了“西南丝绸之路学术讨论会”，掀起了一次研究西南丝绸之路的高潮。此次讨论会收到论文五十余篇，精选后以《南方丝绸之路文化论》为名，由云南民族出版社于 1991 年出版。为了广泛宣传和探讨西南丝绸之路，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的李绍明、童恩正与我国老一辈学者任乃强三人，在此期间还共同担任了由四川省电视台与云南省电视台联合拍摄的 40 集系列电视片《南方丝绸之路》的学术顾问，使这一部巨型科教电视片具有深厚的学术内涵。



经过几年努力，西南丝绸之路的研究已经取得丰硕成果。这条古道在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已得到国内外学术界公认，并形成了重振西南丝绸之路的社会共识。

其二是“藏彝走廊”各民族的语言研究。“藏彝走廊”各民族语言极其复杂，尤其是一些被称为“地脚话”的民族语言，处于底层，往往为通用语言所掩盖而鲜为人知。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组织有关民族语言学者对此进行了调研，其成果已经显露。比如孙宏开同志撰写的《川西民族走廊地区的语言》^①和《六江流域的民族语言及其系属分类》^②等，都提出了一些新看法，引起了国内外学人的充分重视。由杨元芳等同志翻译的陶玛士(F. W. Thomas)的专著《南语——汉藏民族走廊的一种古代语言》一书，亦已出版。

自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由于学术研究重点的转移，“藏彝走廊”的调查研究势头有所减弱，但并未中止，而此中有些成果还相当突出。比如四川学术界的康巴文化研究、金沙江文化研究、牦牛经济与文化研究、禹羌文化研究、岷江上游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彝族毕摩文化研究，西藏牵头的茶马古道研究、昌都地区研究，云南学术界的三江并流区域自然与文化研究、东巴文化研究、卡瓦格博雪山区域生态与人文研究等等都具有代表性，并为中外学术界所瞩目。但是，对“藏彝走廊”的综合或总体研究则稍有欠缺。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自成立以来即十分重视“藏彝走廊”的研究，近年来已有一批成果相继问世，这次又举办全国性的“藏彝走廊”历史文化学术讨论会，可以说是自费孝通先生 25 年

^①载《西南民族研究》，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3 年版。

^②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民族学报》第三辑。



前提出这一问题后，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 21 年前组织六江流域的民族综合考察以来的第三次重大举措，其目的是为了为了使这一问题能再次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我们相信通过这次会议，通过与与会各位专家学者的努力，定能将“藏彝走廊”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关于民族走廊，10 年前我在《西南丝绸之路与民族走廊》一文中下了一个定义，是这样说的：“民族走廊是费孝通先生根据民族学界多年来研究提出的一个新的民族学概念。民族走廊指一定的民族或族群长期沿着一定的自然环境如河流或山脉向外迁徙或流动的路线。在这条走廊中必然保留着该民族或族群众多的历史与文化沉淀。对民族走廊的研究，不仅对于民族学、民族史上的许多问题的解决有所助益，而且对于该民族当前的发展亦有现实意义。”^①现在看来，这一定义还嫌粗疏，不够周密，有补充和修订的必要。

走廊原本是建筑学的一个概念，指一种通道式的建筑形式；后借用到地理学中成为一种地理学概念，如河西走廊即是；此后，又经费孝通先生借用到民族学中成为一个民族学的概念，如“藏彝走廊”等等。但地理学或民族学在借用此词时必须加上地理或民族的前置词加以限制，以免与建筑学所指的原本概念相混淆。学术上的借词多有所见，应该允许，如“工程”一词，原亦为建筑学的一个概念，但现在已经应用到教育、文化等诸多领域，如“211 工程”、“××文化工程”等等，约定俗成，已为大家所接受。

^①四川大学历史系编：《中国西南的古代交通与文化》，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我个人以为,民族走廊虽是一个民族学概念,但它必须与地理学有关的概念有所挂钩或有所对应方能成立。即这一走廊必须首先是自然地理的,然后才有可能有人文地理的,如果运用到民族或族群的长期以往沿此环境迁徙移动研究上,则民族走廊就成为一个民族学概念。何以如此?因为作为人们共同体的民族,它总是附着于一定的土地上,并沿着这片土地的自然环境而移动。但是任何民族在固定的一片土地上迁移的路线是否都可称之为民族走廊呢?答复是否定的。也就是说,民族走廊作为一个民族学概念有其特殊的含义,它必须以地理学概念的走廊通道为前提。简言之,民族走廊的特殊含义在于,某一或某些民族长期迁移的路线必须在特定的自然地理的走廊环境中,始可称之为民族走廊。否则,举凡民族的任何迁移路线皆称之为民族走廊,实际上否定了民族走廊的概念,故泛民族走廊的说法是不可取的。

在中国可称之为民族走廊的约有两处:第一处在西北,在地理学上称为河西走廊,地处甘青,北南均为沙漠,中有一条东西向的祁连山脉,山脉下的南北两麓较为平坦,且受雪山水源灌溉,有不少绿洲适于人居。这条走廊东连甘青黄土高原,西接新疆的准噶尔与塔里木盆地,是中原人走向西域、域外人进入华夏,以及阿尔泰语系诸民族乃至汉藏语系诸民族迁徙移动的走廊。此走廊可称为西北民族走廊。第二处在西南,在地理学上称为横断山脉或六江流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岷江流域)。这一区域北连甘青黄土高原,南接云贵高原,是天然的走廊型通道地带,主要是汉藏语系诸民族,尤其是藏缅语族诸民族迁移的地带,其中河谷适于农耕,高山适于放牧。此走廊以其中所居藏语支及彝语支诸民族为多,故称为“藏彝走廊”。至于南岭走廊等亦曾有人提及,但其特征不如上述两走廊显著,其具体问



题尚待进一步研究。如此看来，西北民族走廊与“藏彝走廊”均有一定内涵。在这些走廊内从古至今发生了若干事件，涉及中外历史、民族、经济、语言、宗教、文化、交通、军事诸多问题，均有待逐一地详加研究。我国现今的少数民族有 80% 以上分布在西北与西南地区，他们的迁移基本与这两条走廊有关。搞清了这两条走廊，可以基本上了解他们的来龙去脉。以上管见请专家学者指教。